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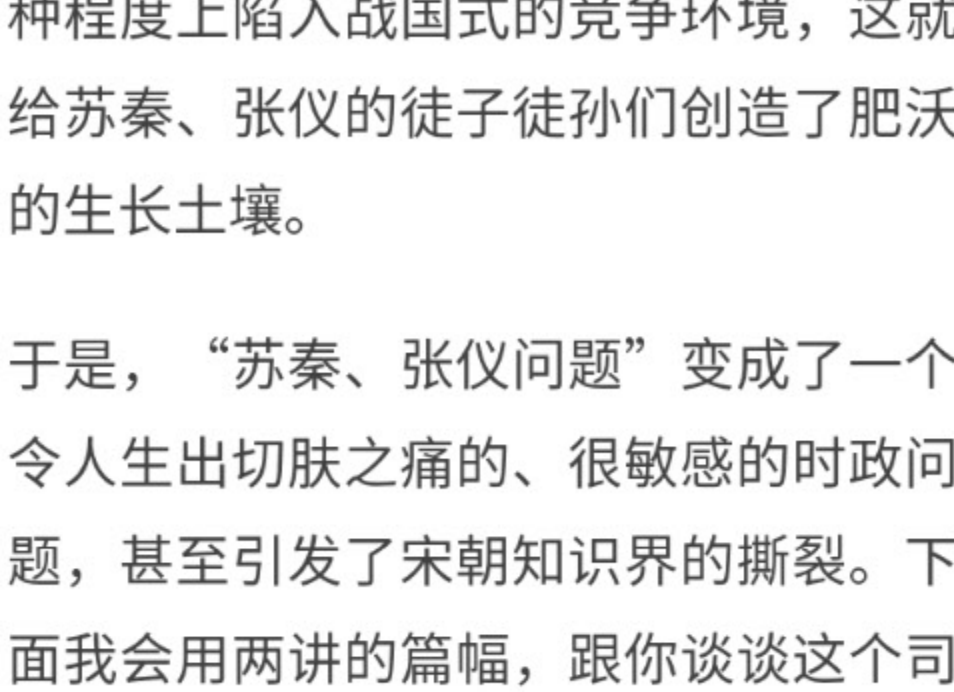
054 宋朝知识界是怎么撕裂的？



熊逸讲透资治通鉴²（年度日更）

[进入课程>](#)

08-23



转述师：金北平

你好，欢迎来到《[熊逸讲透资治通鉴2](#)》。

上一讲谈到司马光之所以审慎地给苏秦、张仪盖棺定论，因为这是一个相当严峻的时代议题。当时的宋朝，正在某种程度上陷入战国式的竞争环境，这就给苏秦、张仪的徒子徒孙们创造了肥沃的生长土壤。

于是，“苏秦、张仪问题”变成了一个令人生出切肤之痛的、很敏感的时政问题，甚至引发了宋朝知识界的撕裂。下面我会用两讲的篇幅，跟你谈谈这个司马光时代里的大问题。

纵横家风格

谁才是新时代的苏秦、张仪呢？或者说，谁才是苏秦、张仪的徒子徒孙呢？

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，宋朝知识分子几乎都是苏秦、张仪的徒子徒孙，因为**宋朝严格实行科举取士，考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策论写作，要求考生针对重大时政问题发表见解**。比如试卷提出这样的问题：现在国际社会一片祥和，我们的边防驻军能不能撤回来呢，让这么多壮劳力搞搞生产难道不是更好吗？

考生展开议论，正常思路无非就是居安思危，养兵千日用兵一时，最多说一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，说和平不是撤军的理由，反而驻军才是和平得以维系的原因，我们不能只看表象，倒因为果……

这些思路虽然都不算错，但试卷如果这么写，中规中矩，只能让主考官打哈欠。

那该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必须出奇制胜，学纵横家那样说话。

上面关于国防的那个问题，真的就是北宋年间的一道策论试题，当时苏轼参加了这场考试，取得了北宋有史以来的最高成绩。苏轼的答案是：咱们让陕西独立出去吧，这样的话，不但国防能力会大幅度提高，国防成本还会大幅度降低，宋朝甚至不再直接承受来自西夏的军事压力了，何乐而不为呢？（参见[《熊逸说苏轼》02-北宋最高分的作文什么样](#)）

这样写作文，算不算哗众取宠呢？

或许可以算，但无论如何，言说效果真的是很惊人，足以让读者打一个激灵。等读者的兴趣被勾起来，沿着苏轼的条分缕析往下读，会发现苏轼倒也真的是可以言之成理。

苏洵犯众怒

这不就是战国游谈之士的做派吗？没错，苏轼的功课主要是父亲苏洵教的，苏洵的文章就是标准意义上的纵横家风格。讨厌苏洵的人最喜欢拿这一点说事，连带着把苏轼、苏辙兄弟也骂进去。

平心而论，他们骂得倒也没错，因为苏洵旗帜鲜明地把道德的正当性和兴亡成败撇清了关系。苏洵写过两部特别离经叛道的小书，一部叫《权书》，一部叫《衡论》。追溯字义的话，简单讲，权是秤砣，衡是秤杆，彼此配套，就有了所谓“权衡”。

《衡论》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：圣人之道，也就是最高统治者应当掌握的管理学核心知识，一共分为经、权、机三类。“经”是可以公之于众的，“权”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私密性，扩散范围仅限于群臣，“机”连群臣都不能知道，只能和少数几名心腹大臣沟通。（《嘉祐集》卷4）

这么一讲，问题可就严峻了。人人都知道圣人推行仁义，但既然仁义是人所共知的事情，也就只能说明仁义属于经，连权都算不上，当然更不是机了。这就意味着，如果当真把仁义当成治国平天下的不二法门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

要想治国平天下，就必须突破经和权的局限，深入机的领域，然后就会发现，只有那些高明的、不可告人的谋略，而不是仁义道德，才是成败的关键。

这种观点显然很犯众怒，完全是一副阴谋家的嘴脸，但深究起来的话，倒也并不违背儒家古训，因为儒家的政治思路本来就是家长养育小孩子的思路，这才会有所谓“神道设教”，会有所谓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。

所以，脑筋活络的儒家知识分子并不难认可苏洵的见解，自然也就看不上那些认死理的家伙。

成败的运气

哪些人认死理呢？最典型的就是二程兄弟。在他们心里，只有正当性才是兴亡成败之本。所以，他们有一个特别独到的读历史书的方法：看一件事，看到一半就停，把书合上，好好地琢磨一下事情的发展，预判事情的结局。

但结果发现，自己的预判竟然经常落空。

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难道是自己的水平太低吗？

冥思苦想之下，终于找到了症结：不怪自己水平低，要怪就怪运气，因为兴亡成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运气，这才会有很多本该成功却不幸失败的事情，也有不少本该失败却侥幸成功的事情。

二程因此慨叹：现在的人啊，总是喜欢以成败论英雄，殊不知那些成功人士并不是因为找对了方法才终于成功的，失败的人也未必真是因为没把事情做对。

所以读历史，要想以史为鉴，必须留意的只有两点：一是“圣贤所存治乱之机”，也就是圣贤关于兴亡成败的深刻而正确的认识；二是“贤人君子出处（chǔ）进退”，也就是知识精英当中的好人在什么情况下建功立业，又在什么情况下隐居不仕。**如果只看成败，只从成败当中总结经验教训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**（《[二程遗书](#)》卷19）

二程的这种观点，在今天看来可能有点迂腐，但在当时来看，尤其是在当时的儒家阵营里来看，其实很有几分前卫感。

前边讲过，所谓圣贤，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涵义。圣人原本既要有德，也要有位，有德就该有位，反过来同样成立，有位就该有德。因为“圣”这个字，本义是听觉敏锐，引申义就是聪明智慧。在朴素的认识里，一个人如果特别聪明，特别有智慧，怎么可能不成功呢？

退一步说，就算时局险恶，一个聪明人至少也应该具备明哲保身的能力，否则就不配称为聪明智慧。至于君子，除了需要具备道德光辉之外，还要配备相应的聪明才智。那么问题来了：有些看上去分明属于君子，甚至应该被奉为圣贤的人，竟然没得好死，他们到底还算不算圣贤或者君子呢？

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屈原。有人问过扬雄：屈原算不算智者？

扬雄的回答相当令人费解，原话是这样的：

“如玉如莹，爱（yuán）变丹青。如其智，如其智。”

到底什么意思，看不懂。今天《扬子法言》的注本通常把这句话解释成扬雄对屈原的赞美，夸他是一个玉石一般的君子，并且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但司马光不这么看，说扬雄这是在批评屈原不智，正因为不智，才落得个悲惨结局。（《法言集注》）

到底哪种解释才对，如果只从文本出发，注定得不出答案。但司马光从小就爱读扬雄的书，所以很能领会扬雄的一贯主张。

扬雄生当西汉末年，道家哲学在当时还很有市场。

道家高举反智主义大旗，认为聪明只会反被聪明误。扬雄起而反驳，说那些反被聪明误的人非但不是因为聪明，而是因为不够聪明。换言之，一个人只要真的聪明，就不会反被聪明误，而是完全有能力避害全身，并且福及子孙。

商朝大贤人箕子就是典范，虽然生在乱世当中的乱世，陪着暴君当中的暴君，但凭着聪明才智，没给纣王卖命，而是去给周武王陈说《洪范》，这不好好活下来了嘛。（《法言·问明》）

所以在扬雄的哲学里，成败是足以论英雄的。这也难怪二程哲学在宋元以后成为主流，因为道德也好，儒家意义上的智慧也好，确实和成败渐行渐远了。但如果采用扬雄的标准，即便仅以个人的功名利禄而论，苏秦、张仪这样的人也很难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人士。

站在皇帝的角度，怎么提防新时代的苏秦、张仪，这才是重中之重。

就拿宋神宗来说吧，看着眼前来来往往的这些儒家精英，到底谁是苏秦，谁是张仪呢？

是王安石呢，还是三苏呢？当局者哪里容易看得清楚。

新党人士批判三苏是纵横家、阴谋家，学术不纯，心术不正，旧党人士把同样的屎盆子扣在王安石头上，道理竟然也说得通。

那么，谁能给宋神宗出出主意呢？我们下一讲再谈。

划重点

[添加到笔记](#)

1.宋朝科举取士的重要内容是策论写作，要求考生针对重大时政问题发表见解。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，宋朝知识分子几乎都是苏秦、张仪的徒子徒孙。

2.苏洵有两部离经叛道的书，主张治国平天下，必须突破经和权的局限，那些高明的谋略，而不是仁义道德，才是成败的关键。

3.二程认为，兴亡成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运气，只从成败当中总结经验教训就大错特错了。

#跟着熊大读《资治通鉴》

我们为这门课配套了一个知识城邦学习话题，欢迎你记录学习收获，和其他同学互动交流，一起完成这场马拉松学习。课程老师@熊逸、主编@李倩也会不定期出现在讨论区哟~

[戳此参与讨论>](#)

[< 前一篇](#)

[后一篇 >](#)

赞赏

如此好文章，快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吧！

[微信](#)

[朋友圈](#)

用户留言

[默认](#) [最新](#) [只看作者回复](#)

李盈 [+关注](#)
8月23日

宋朝已经是平民社会了，这一点和苏秦张仪所在的时代已经大不相同，就算苏秦张仪投胎转世到宋朝，他们也找不到当年那种纵横捭阖的感觉，他们能调动的资源也会非常有限。

所以对于宋神宗来说，他大可不必把重要精力放在寻找苏秦和张仪的身上。他应该很自信的认为，就算本朝有纵横家，也不会翻了天，而且他还能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。

对于宋朝来说，真正需要考虑的，是邻国的身份定位。也就是说，是否把儒家倡导的那些礼数用在邻国的身上。邻国究竟是传统意义上的蛮族，还是另一个合法政权。

#跟着熊大读《资治通鉴》

2

3

100

分享